

缅怀报业先驱:铁肩担道 振此晨钟



特别关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批思想进步的报人在这一时期创办了一批报纸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启迪了民众思想。这些业界前辈不惧权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些报业先驱。

铁肩辣手

邵飘萍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他首创的新闻编译社,是中国最早的通讯社之一,他创办的《京报》是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他著书立言,培育了大批专门人才,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邵飘萍,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萍、青萍、素昧平生等。1908年春,邵飘萍求学时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等创办《一日报》,初涉报坛。在此期间,邵飘萍同时应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金华通讯,开始和真正的新闻事业发生联系。1916至1918年,邵飘萍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地位甚高。驻京期间,他在北京创办了一所通讯社——新闻编译社,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北京的垄断地位,并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主编。

为施展新闻抱负,1918年10月,邵飘萍以个人之力,在北京前门三眼井创办《京报》,提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的宗旨,致力于把《京报》办成一张爱国反帝的报纸,这标志着他独立办报的正式开始。

为改良中国的新闻事业,使之向现代新闻事业靠拢,邵飘萍以《京报》为主阵地,在结合中国实情传播现代新闻理论、把报纸办成现代含义的新闻纸、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作为“五四”运动前夜诞生的一份进步报纸,《京报》既受益于新思潮的哺育,又代表着前进的新潮流,堪称漫漫黑夜中的一盏耀耀明灯。创刊伊始,邵飘萍在编辑部办公室欣然命笔,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正面上,勉励同人齐心协力办好《京报》。

邵飘萍自筹资金独立办报,言论不受帝国主义通讯社左右,也不受北洋军阀操纵,力排各种反动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开创了独立的中国新闻事业。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后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还应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邵飘萍这样主张,也这样做。他在广告栏中,介绍《新闻周刊》,推进新闻学的研究,介绍《每周评论》《国民》杂志,就是为了宣传爱国反帝,倡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支持民众斗争,抨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顺应新文化的潮流,冲击封建专制。他要把《京报》办成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喉舌。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的《京报》,既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代表着新潮流,不久便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舆论阵地。

与此同时,邵飘萍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工作,并与戈公振一道,应邀担任该研究会的导师,和当时是研究会会长的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1919年8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将《京报》查禁。邵飘萍被迫逃亡,东渡日本。幸得张季鸾推荐,应聘为大阪《朝日新闻》社顾问,并借机系统地考察、研究了日本的新闻事业。流亡日本期间,深受苏俄革命思潮的影响,邵飘萍写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并预言“今后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尤著”。

1920年皖系军阀倒台,邵飘萍得以重返北京并恢复出版《京报》。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当中国历史大转变之时,担负起在北方宣传革命的时代职责。在直系、奉系军阀炙手可热之时,他公然直斥其为“国民公敌”,攻击军阀之间的内斗为“以暴易暴”“毙一虎而仍生一狼”,指出军阀政府的统治“比强盗更可怕”。邵飘萍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他主办的《京报》名列“须扑灭的报章”之首,《京报副刊》名列“须扑灭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通缉名单。

1925年,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18日,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同年4月24日,张作霖为报宿怨,将邵飘萍逮捕。4月26日,在未经公开审讯的情况下,邵飘萍被秘密处以死刑,其所谓之罪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年仅40岁。

晨钟长振

李大钊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



在“五四”运动时期,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晨钟报》是李大钊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日报。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从日本回到上海。7月初,应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之邀,乘轮离沪北上办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该报首任总编辑是李大钊,经理是刘道坚。《晨钟报》的报名为李大钊所取,寓意为“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历史使命”。报头图案也是李大钊亲自设计:报头印一古钟图案,钟上每天刻一条警句,第6号上的警句是李大钊常吟咏的“铁肩担道义”。

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申明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他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寄托在觉醒的中国青年身上。在主编《晨钟报》的短短22天里,李大钊共发表了14篇文章。这些文章宣传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欧美新思潮,倡导反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丑态,以致招来不满和阻挠,使他难以工作下去,不得不离开《晨钟报》。

1918年2月,通过章士钊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这时,《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到北大工作后,李大钊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广泛搜集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革命运动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李大钊在日本时就接触过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向往在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道路,创造一种新生活。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军国主义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那(哪)一国或那(哪)一国的军国主义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那(哪)一国或那(哪)一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李大钊还在《新青年》6卷5号、6号上,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近3万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勃兴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在1919年前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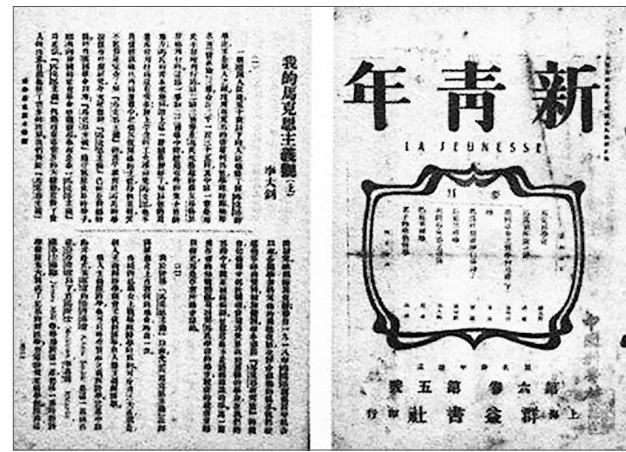
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馆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现在门牌64号)。李大钊为了创办《每周评论》不辞辛劳地奔波,担负了大量的编辑和事务工作。创刊号开印那天晚上,他亲自在馆内校对,直到凌晨四点,才拿上一份新诞生的《每周评论》,满怀喜悦,顶着寒风徒步回到西单的寓所。

《每周评论》的出版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斗争。李大钊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笔,针对国内外的时事,一事一议,泼辣犀利,短小精悍。这些文章像投枪匕首揭露了反动当局的罪恶,像潺潺清流启迪着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了迎接1919年元旦,李大钊为《每周评论》写了社论,题目是《新年》,文章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去打败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个新纪元的曙光已经照到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他号召人们“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事业”。

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开始负责《晨报》第7版(即该报副刊版)的编辑工作,对该版进行重大改革,特别增加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这就是著名的《晨报》改革。《晨报》副刊改革后,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5月1日,推出“劳动节纪念”专号;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晨报》第7版又特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的生平传记。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着铁肩担道、晨钟长振的办报理念,传播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唤起民众觉醒,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 □任超



周末评论

一起名一线“带货网红”在直播中的一次推广营销为企业带来多少收益?直到人称“口红一哥”的李佳琦在直播中“在线翻车”,人们才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竟然有可能是个“负值”。

由一个粘在锅底的煎蛋引发的网络闹剧,在公众的嘲笑声中粉碎了涉事锅具的产品影响,同时也让李佳琦长期努力打造出的“营销之王”人设,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痕。再多的账面收入,也不可能弥补他在这起事件中蒙受的损失。

李佳琦失去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商业领域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便是信誉。此前,李佳琦之所以能在口红营销中“百战百胜”,走上带货网红的行业巅峰,靠的是他在长年累月的直播中,凭借货真价实的开箱试用积累起来的个人信誉;而今天,那么多曾经为李佳琦心甘情愿掏钱的资深粉丝对其反唇相讥,也源于鸡蛋粘底现象摧毁了他辛苦积攒的个人信誉。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信誉不仅对个人的信誉至关重要,在商业行为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担保作用。要让消费者在并未试用过产品的情况下,花钱将自己的需求托付给特定产品,就必然要依赖营销者过往拥有的信誉,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这种将过去的信誉转化为消费者未来的信赖的过程,是许多营销模式的本质。

近些年间新兴起的KOL营销模式和过去常见的主流营销模式的巨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为这一过程供应信誉的主体,从产品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变成了个体化的一个个“带货网红”。对此两种模式,传统的营销模式可以称之为“信誉直销”,谁生产、销售产品,谁就要为营销提供信誉;而KOL营销模式则可以称之为“信誉分包”,生产者和销售者仅提供部分信誉,更多的信誉都由类似分包商的“带货网红”们供给。KOL营销模式的出现,固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营销创新,但却并不能改变营销的本质规律。对

一口不粘锅 戳破了什么

营销活动而言,不论用的是生产者与经销商自己的信誉,还是从带货网红那里“租”来的信誉,一旦产品本身辜负了消费者的期待,最终的结果都注定只能是信誉透支,最终造成整场营销活动的崩盘。

产品立得住,营销才有意义——这样的道理是如此的朴素简单,以至于任何一家零售企业的经营者都应该该懂。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在KOL营销模式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带货网红”而言,由于他们的工作只局限于营销层面,而与产品的生产距离太远,很多人似乎并不是很懂这个基本的道理。行业风口的出现,让他们收获了辉煌的成功。在报酬不菲的合同的诱惑下,不少“带货网红”都贸然跨入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但他们恰恰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特定领域红起来,靠的不仅是漂亮脸蛋或是口舌之利,而更是自己对这个领域情况的熟悉和观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们选择合作伙伴不慎,碰到了“粘底的”不粘锅之类的产品,最终只能造成甲乙双方双赢的局面,无异于自毁事业的长城。

因此,对KOL营销模式而言,这次事件虽然充满了负面属性,但对行业而言,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为业内标杆,李佳琦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翻车”,给所有同行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警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双十一”即将到来之际,广电总局近日下发文件要求相关直播节目要用语文明、规范,不得夸大其词,不得欺诈和误导消费者。监管与警示并行,“双十一”狂欢中的直播行业应向更加规范、更加健康迈进。 □杨鑫宇



新药上市,阿尔茨海默病治疗峰回路转?

用“峰回路转”和“另辟蹊径”来形容近一段时期让人困惑的阿尔茨海默病(AD,又叫老年痴呆症)再合适不过——

一款正在研发的新药 Aducanumab,曾宣布在AD临床试验上失败,日前经过数据再评估后,又认为部分数据可以证明药物有效。这一峰回路转,使其背后的假说也有了希望。

11月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了甘露特钠胶囊(商品名“九期一”,代号GV-971)上市注册申请,用于轻度至中度AD,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这一AD新药的研发被认为另辟蹊径、颠覆性揭示了靶向脑肠轴的抗AD发病全新机制。被民间俗称为“老糊涂”的AD,为什么在机理上令人糊涂?目前的假说为什么摇摆不定?治疗AD的研究方向究竟在哪里?11月4日,笔者采访了神经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旭。

在现象层面谈机理 容易“胡子眉毛一把抓”

痴呆症是临床表现,它背后的原因却可以多种多样。“β淀粉蛋白的沉积、缺血或者遗传等都可能造成神经元的损伤,最终诱发痴呆症的发生。”张旭说,但很可能它们背后的机理并不相同。

有资料显示,AD是痴呆症的一种,针对AD如何发病存在三种假说:淀粉蛋白级联假说、APOE4假说和Tau蛋白假说。

淀粉蛋白级联假说,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哈迪提出,他认为该疾病起源于脑内β淀粉蛋白的形成,而神经纤维、神经细胞死亡、记忆力衰退以及痴呆症都是淀粉蛋白对脑内破坏引起的二级事件。这一假说认为β淀粉蛋白是病因。

近二十年来,以针对β淀粉蛋白为靶标的AD治疗研究都以失败告终,礼来、默克、辉瑞等都在这一领域折戟。研究发现,AD患者的神经系统中确实存在多种错误折叠蛋白,进而构成不可溶的聚合物。但巨资的临床研究给出的结果是,以消除β淀粉蛋白为目标的实验药物组与安慰剂组没有显著差异。人们开始怀疑,消除这些蛋白能不能恢复认知。另一种可能是,β淀粉蛋白不是病因而是结果。

“目前,β淀粉蛋白的沉积是临床上诊断AD的唯一标志,但临床上也存在β淀粉蛋白

有沉积,却不发生神经退行等症状的情况。”张旭表示,β淀粉蛋白是因还是果的问题,目前并没有定论。

第二种假说与一个名为APOE4的基因相关,假说提出者发现携带APOE4基因将会大大增加AD风险,携带一个基因拷贝会使风险提高4倍,而携带两个基因拷贝将会使风险提高12倍。这一基因的高表达会影响脑内血糖的正常摄取,长期营养摄取不足可能引起患病。

“缺血可能是痴呆症的另一种诱因,即血管性痴呆症,它与β淀粉蛋白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张旭说,“这启示我们,在临床现象上,应通过进一步诊断,对有痴呆症表现的患者加以区分。”

第三种Tau蛋白(微管相关蛋白)假说发现,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会导致神经元内缠结的形成,致使微管脱落并影响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物质在神经元内的运输,进而导致突触退化、神经元的死亡。

以往研究证明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最早使得大脑的海马区受累。张旭告诉笔者:“在临床诊断过程中,Tau蛋白的量可以用于对海马皮层的影响作为参考指标,用于辅助诊断AD的特性,为治疗给出相对细分的参考。”

将所有关于痴呆症和AD的假说统一到一比较范畴,容易“胡子眉毛一把抓”,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答同一个问题。“AD只是痴呆症中的一种,它作为代表性疾病,对其病因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通过分析很多细节试图还原这个病的系统机理,但目前并没有找到答案。”张旭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问题范围很广泛,也很可能最终发现并不是同一个病因。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 仍处在“盲人摸象”阶段

对于大脑中出现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目前似乎还处于碎片化的“盲人摸象”阶段。有没有可能从纷繁的细节中跳脱出来,找到提纲挈领的角度呢?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科学家开始关注痴呆之外的病理现象,有研究显示,AD患者的脑内存在异常高水平的炎症因子及其相关免疫炎症的标志性物。这打开了免疫科学与脑科学之间的通道。

尽管目前仍不清楚炎症因子是因为有了

AD的病症之后机体的防卫,还是AD的起因,但可以尝试清除炎症因子,看是否能改善认知功能。

据GV-971发明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欧美美教授此前介绍,GV-971抗AD作用机制独特,除了抑制β淀粉样蛋白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控肠道菌群降低脑内炎症反应。该制剂能够靶向AD发病的多个环节,多靶点一齐发力,既能针对重点也能兼顾大局。

可见,虽然对于AD发病的机理仍不确定,但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对付AD的妙药不是“单线程”,而是“多面手”。

“近些年,已有研究从理论上证明GV-971对体内产生效果的机理,但整个机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没有画出一个完美的‘联络图’。”张旭表示,但这个药物的获批以及今后的临床应用,将为后续开展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给出无限的可能和广阔的研究方向。

解密复杂脑疾病 人类的研究只前进了一小步

拆解还是整合?分割研究还是系统性研究?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思路一直在其间摇摆。对于大脑的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机理解析,哪种思路又会更合适呢?

纵观AD的应对思路,从一无所知到抓到仅有的确定性“标志物”,人类的研究前进了一小步,一直停留在分割的研究阶段,目前仍需要有一步的研究关注在寻找更新的确定性的标志物上。

而下一阶段,更大的收获或许会出现在系统性研究阶段。“GV-971的出现,为促进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and 手段。”张旭说,它所作用的或许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主要作用通路,它带来的启示在于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均可能通过脑肠轴的作用对大脑产生影响,而具体详细的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在具体临床实施上,我们也注意到,对于AD的研究应该从临床的源头进行细分,在细分数据的基础上,随后再进行基础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张旭说,只有将患者的病因进行细分,才能解答病理过程与正常的衰老过程有什么区别等问题。

视点

□张佳星